

物件「說」故事——博物館的政治與詩意

文·戴蕾

「物件」是博物館的專業。博物館一直被視為是蒐藏、保存、研究與展示物件，並透過物件從事教育的機構，一如圖書館專業對書籍所進行的編目各項工作，博物館專業則環繞著物件而展開。然而，自1970年代新博物館學思潮興起，博物館「處理物件」的角色開始受到質疑，80年代英國由柴契爾夫人當政，民營化的風潮也吹向博物館界，博物館面臨到必需與其他娛樂事業競爭的現實，行銷及教育因而被納入博物館的專業領域中。其次，受後殖民、後現代等思潮的影響，博物館服務帝國主義及中產階級的角色備受批評，博物館生產知識的公信力及如何更易於大眾所親近（accessible）等問題也浮上檯面。

環繞上述議題發展而出的種種博物館論述中，本文將討論博物館對物件的處理，並以當代博物館中的物件展示為例，討論博物館如何透過物件呈現多元價值。博物館之所以有別於圖書館、資料庫、文化中心等社會文化機構，在於博物館以物件為媒介，處理美學（如美術館）、歷史與記憶（如歷史博物館）、人類文化（如民族學及人類學博物館）及科學（如科學博物館）等面向的知識；博物館不只藉著物的研究探索自然與人類世界，也透過物件教育大眾。

然而物件在博物館中並非中立的，博物館詮釋物件具有政治與經濟意涵。以十九世紀歐洲為例，帝國主義與工業革命在歐洲已發展到一個階段，社會形成一群中產階級，領導了歐洲的政經與文化。當時歐洲社會充斥著「進步」的觀念，演化論不只被用來解釋自然界，也被用來解釋人類社會與文化；「進步」的觀念也主導了當時博物館對異文化物件的詮釋與陳列。其中，彼得·瑞福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中武器的陳列便是這類展示的代表，該博物館的上層（upper gallery）陳列著不同文化與社會來源的武器，並依技術及功能的



圖一：彼得·瑞福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槍枝櫥窗，拍攝時此櫥窗位於博物館一樓，2010年1月博物館上層重新開幕，槍枝櫥窗再次與其它文化的武器一同陳列。（攝影／邱東昇）

繁簡排列著，用以說明製造技術的演化順序，而槍枝櫥窗（圖一）則說明了西方技術與其他文化的不同。

Pearce (1993) 指出，物件在十九世紀演化論博物館中，乃以“標本”的形式在系統中被展示著；在彼德·瑞福博物館中，槍枝在展示中的功能類似自然史標本，陳列的目的是為了證明演化論。這種展示方式大量運用在當時民族學展示上，展示的目的不是為了展示物件本身，或透過物件說明特定的社會或文化，而是透過特定的排列，說明系統化的知識。在演化論以及帝國主義的架構下的展示其實只是人類學所假設的社會與文化，不只未呈現當地人的詮釋，物件本身也只是在展示中被操弄的客體。

多元意義的物件——後現代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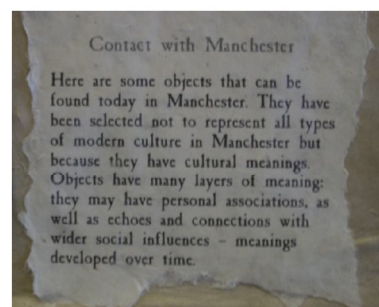
有別於傳統博物館對物件的處理。物件在實際生活中具有社會生命而呈現多元的意義；物件隨著社會生命的發展進出於各種社會情境，依使用者及觀看者不同的位置與角度，呈現不同的社會意義。然而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場域 (institution)，基本上有其政治與經濟意涵，除了前文所提演化論博物館或帝國主義博物館對「進步」的迷思外，美術館也抱持著對藝術、精品、技術等價值的堅持，例如，當我們考慮什麼樣的物件才值得博物館收藏與展示時，大部分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考慮價值連城、極富藝術成就的精品吧！這顯示物件進入博物館以後雖脫離了商品階段，但其仍無法脫離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 (pearce)。博物館也因此只傳達了特定階級的價值觀念。博物館如何展現物件的多元意義呢？如何藉物件的物質性 (materiality) 呈現豐富的故事？

物件「說」故事——詩意的博物館

Pearce指出物件的物質性 (materiality) 能讓人重溫特定的歷史情境，承載環繞著它而發生的人、事及活動 (她稱之為parole)；物件同時具有符號 (sign) 與象徵 (symbole) 性質，因此既能承載歷史更能詮釋未來 (Pearce 1993: 26、27、30)。例如，在曼徹斯特博物館世界文化 (World Culture) 展廳的「接觸曼徹斯特」 (Contact with Manchester) 展櫃 (圖二、三)，陳列著許多代表著曼徹斯特生活的物件：一個裝有雨傘、雜誌、影片膠卷的超級市場推車，啤酒罐子、電腦磁片、CD、某年曼大畢業生合



圖二：曼徹斯特博物館「接觸曼徹斯特」 (Contact with Manchester) 展示 (攝影/戴蕾)



圖三：「接觸曼徹斯特」之主要說明文字 (攝影/戴蕾)

照、查理與黛安娜馬克杯，甚至曼聯足球隊圍巾，展櫃的說明文字寫著：

接觸曼徹斯特

這邊是一些可在今日曼徹斯特找到的物件。選擇陳列它們並非為了呈現所有當代的曼徹斯特文化，而是因為這些物件具有文化意涵。物件具有許多層次的意涵：他們也許與個人具有關聯性，也回應並聯結更廣泛的社會—物件的意義隨著時間而發展。

物件的詩意不只在於豐富的符號，其承載著人們記憶、供人們“閱讀”與詮釋，因觀看者及時間的不同，使物件產生多元的象徵。「接觸曼徹斯特」內的物件同時包含個人、地域與國家的符號：徽章、商品標籤、畢業服、數位產品、王子與公主……。但這些符號代表什麼？具有什麼意涵？曼徹斯特博物館的展示並未回答這個問題，反而讓觀眾自己猜想其涵義——曼城地區的男性生活（啤酒、足球、汽車雜誌）？曼城的觀光業（觀光商品）？個人回憶（紀念照、紀念品）？大眾文化（搖滾樂、偶像——黛安娜與查理——崇拜、商品、雪拼——超商推車）？對曼城市民而言這些物件毋寧與生活習習相關，但其意義端看個人的經驗與詮釋，呈現不同樣貌的曼徹斯特——對某個階級來說，這些物件陳述了曼城的學術與文化發展（曼徹斯特大學畢業生、數位化城市及曾開發世界第一台電腦的殊榮），但對另一階級而言，它們展現了世俗的活力；而對我這個半個觀光客的留學生來說，這些東西回應著腦海中對旅程、英國及曼徹斯特的片面印象（印有各式徽章的紀念品、王室、勞動階級、足球、啤酒……）。幾年之後，這些東西蛻變為「歷史」，又因觀眾的來源不同，而承載不同的意義，什麼是曼徹斯特認同？曼徹斯特是什麼樣的地方？「接觸曼徹斯特」並打算回答這個問題（儘管解答類似的問題是博物館的權力），而是透過觀眾的多元詮釋，呈現無限的詩意。

物件一面讓人回到過去，卻又留有無限想像與詮釋的空間。例如，利物浦梅西河岸海事博物館展示著鐵達尼號上的救生衣（圖四），略微發黃的救生衣，透過“活生生”的「物質性」，讓人們重新經歷鐵達尼的災難與傳奇，還有什麼比站在這櫥窗前更讓人貼切感受到事件的真實性？救生衣本身可能真的被船難經歷者穿過，並接觸過災難時的海水；藉著與鐵達尼的關聯性，這個展示也訴說了利物浦海事業的傳奇——當年建造鐵達尼這艘轟動當時、號稱速度最快的船的船公司正以利物浦為根據地，也因為這一層淵源，這件救生衣才輾轉至利物浦，成為博物館的蒐藏。由災難故事、航海工業到地方認同，鐵達尼號的救生衣讓我們回到事件現場，更藉著物件的流動，訴盡了老利物浦的風光與淵源。

物件的社會生命

物件具有社會生命，博物館物件的生命歷程，透露出旅程、接觸與移動等饒富詩意的內容。瑞士威薇食物博物館（Vevey Food Museum）「吃」（Eating）展廳內一個稱為「湯



圖四：利物浦梅西河岸海事博物館內的鐵達尼號救生衣（攝影／邱東昇）



圖五：威薇食物博物館「湯蓋碗傳奇」展示（攝影／邱東昇）

蓋碗傳奇」(the Saga of the Soup tureen) 的展示中，展示著一個陶瓷湯蓋碗（見圖五），乍看之下這個的湯蓋碗相當普通，每個瑞士家庭都可能擁有一個這種湯蓋碗——純白、沒有雕花裝飾，不是古董，非名家設計品，也沒有名人使用過；這麼普通的物件，不論在美學、歷史上都不具代表性，在有限的博物館展示空間展出這麼“一般”的物品恐怕會引起爭議吧？但威薇食物博物館卻透過

「包裹」(Package) 的展示手法講述這個湯蓋碗的「生命故事」，觀眾可以透過展示組件中的聽筒及可翻閱的彩色展板，閱讀並聆聽湯蓋碗由生產、販賣、在家庭中被使用到被博物館蒐藏的故事——即便一個普通的湯蓋碗都承載著一個家庭一起用餐的記憶，以及物件流轉後被博物館蒐藏，成為博物館藏品的故事，即使非典藏精品也承載著動人的故事。

以物件為中心的博物館教育

「湯蓋碗傳奇」除了訴說湯蓋碗的故事外，也展現博物館以物件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物件的意義是多元的，物件本身除了其目的不只在於訴說這件湯蓋碗的故事，更在於示範如何透過物件探索歷史及意義，在展示上，「湯蓋碗傳奇」盡量用適合兒童的圖片及語言來說故事，教導兒童如何藉著物件 探索與“發現”(discovery)。同樣的例子還有利物浦世界博物館 (World Museums Liverpool) 維斯敦發現中心 (Weston Discovery Centre) (圖六)，維斯敦發現中心是由該博物館世界文化 (World Culture) 展廳延伸而出的教育學習中心，除了書籍、電腦等設備外，最特別的是該中心進行教育活動時，使用了大量的民族學典藏品；兒童觀眾在發現中心中，可以動手把玩物件，透過放大鏡或顯微鏡觀察物件的



圖六：利物浦世界博物館維斯敦發現中心入口面版（攝影／戴蕾）

年紀、形狀、設計、材質及各種特徵，藉著探索與觀察發現物件背後的故事。維斯敦發現中心入口處的輸出面版以擬人化的口吻寫出幾個疑問句，簡短地介紹了研究物質文化的方法：「我（物件）是誰？」，「誰曾經擁有過我（物件）？」，「我（物件）今年幾歲？」、「為何我（物件）在博物館中？」，「我（物件）來自何處？」，這幾個疑問句成功地引導了觀眾如何透過物質文化探索自己以及世界。

小結

博物館同時是一個饒富詩意但也具有政治意涵的場域。博物館中的物件因其豐富的社會生命，承載了歷史，也記載了多元的社會觀點，物件的物質性使其在社會過程中具有主體性，物件本身為符號，其象徵性具有詮釋歷史、界定現在與展望未來之潛力。然而，物件並非以中立的姿態存在於博物館中，物件在博物館中的意義因「誰在說話」與「說誰的故事」而有不同的意義與性質，例如本文所舉彼得·瑞福博物館槍枝展示的例子，其背後所隱含著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的立場。

那麼，我們應如何拋棄博物館的權威，在博物館中展現物件的多元意義與觀點呢？此刻我們應回歸物件本身，藉著物件的物質性說故事，關注於觀眾透過物看到了什麼、感覺到什麼，以及從物件上發現了哪些關於自己的生活、歷史以及經驗的故事；物件的社會生命不隨著進入博物館而終止，其意義亦因人與物的相遇而一再展開，「湯蓋碗傳奇」以及維斯敦發現中心的例子，呈現博物館營造人與物在博物館中相遇的誠意，任何人（不論其背景與來源）都可以在博物館中自由地藉著物件發現世界以及自我，用感官聆聽物件所訴說的故事，進而詮釋其意義。過去博物館的權威使人將博物館傳達的知識與「教條」畫上等號，若今後我們能夠“聆聽”物件，必能拋棄博物館呆板的印象，使博物館成為一個能帶來詩意經驗的場域。

（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參考書目

Pearce

1993 Museum,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